

南通实验通剧团：当年艺苑有蕙兰

□陆长祥

曾经市里文化界的一些人士，对原有的童子音乐如何保留、如何使用、如何发展，是有不同想法的。

一部分人认为童子音乐已经过时，倾向对童子音乐大动手术、大幅度改造，逐步走“新歌剧”的道路。这种改造在当时曾一度推动了童子戏向都市文化发展的进程。

另有一些人希望保留童子音乐的原腔原调、原汁原味，不希望对其过多过大地动手脚，以为童子音乐若离开了生它养它的水、肥、土壤，就会成为一棵无根之苗，渐渐失去原有的基调和乡土魅力、平民气息以及南通的风情风韵，以致渐渐失去原有的铁杆戏迷和观众。

我曾在1981年4月21日《南通市报》文艺版上《谈通剧》一文中表示，童子音乐已历经百年以上的锤炼，基本定型，而且在城郊远近能唱上一段的“知音”比比皆是，以不改为宜。如果改成了“通歌”，反而不好。欢迎大家与我探讨。

左图：当年剧团的节目单；右者在《南通市报》上发表《谈通剧》一文。

登上南京的省级舞台，上演了由刘海铭、汪巧主演的现代戏《上河工》。

1960年7月剧团的中型现代戏《绿野红花》在南通专区第四届现代剧会演中荣获创作奖和演出奖。

1961年由孙大翔编剧、李少麟作曲，吴健、罗浩、易纪导演，刘海铭、陆瑞芝、汪巧、易纪等主演的大型五幕现代戏《好书记》，不仅演员阵容宏大、乐器配置丰富，还首先在童子戏演出中使用了小提琴、大提琴、扬琴、木管等，舞美也突破了旧的框框，使得全团演艺水平上了一个档次。该剧上演不久，团里就接到省宣传部门的通知，赴南京为中共江苏省委扩大会议进行了专场演出。

1963年7月，剧团在人民剧场（现现俗剧院）上演大型现代童子戏《杨立贝告状》，连演37场，场场爆满，一票难求。

剧团还先后深入到33个人民公社巡回演出了《好书记》《李双双》《白毛女》《夺印》《活捉罗根元》等10多个现代剧目，演出384场，观众达18.3万多人次。

南通市实验通剧团在前后长达7年的时间里，不仅丰富了南通观众的文化生活，让众多的童子戏迷们能经常欣赏到自己喜欢的乡音、乡调、乡曲、俚语，同时也在弘扬民族文化、传承地方民间戏曲方面作出了重大深远的贡献。

由于时代等一些复杂的原因，剧团1964年9月撤销解散。

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市实验通剧团

虽然停办，但是我市近郊和通州区童子戏的演艺活动并未停滞下来，他们以顽强的生命力不断在延续滋蔓。在广阔的江海大地上，为数不少的民间演出团队顶着烈日、冒着寒风，足迹遍布城区和大小乡镇，既满足了广大童子戏迷听戏的愿望，同时也让童子戏这一朵江海平原的民间艺术之花代代相传。

1977年4月，市文化馆通剧小组创作和排演了《换堡》《喜搬家》《三家亲》等现代小戏，同年12月，小戏《谁住这间房》参加了省业余文艺汇演，获创作奖和演出奖。

改革开放以来，由于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和有力保护，童子戏又获得了新生。通州区及南通市非遗保护中心通过调研、整理，分别把童子戏向省、国家非遗保护机构进行了推荐和申报。2006年，童子戏入选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；2008年，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
当年在市实验通剧团工作并作出贡献、陪伴了童子戏演艺事业一生的老童子中，有的后辈继承祖业，继续活跃在童子戏的舞台上。如李金玉已离开我们二十多年了，然而他的两个孙女李美芹、李美华继承了祖辈的才艺，活跃在童子戏的演艺活动里。李美芹先后被授予通州区和南通市的“非遗项目童子戏传承人”称号。

我市非遗保护部门在开设多个展览基地的同时，开办了多个传承基地。不仅向社会和广大市民开了一个宣传和展示的窗口，也给予了众多非遗传承人和广大爱好者一个家。



任港路是在上世纪20年代老路的基础上修建的。道路线形弯曲、路面狭窄，1949年后曾多次进行改善。上世纪80年代末，由沿线各单位集资，政府补贴的办法扩建任港路。全线分东西路两段拓宽改建。东段路面由7米拓宽到13米，西段路面由6米拓宽到9—10米，全线新铺筑了半刚性基层、沥青混凝土路面，完善了道路排水管道，两侧修建了人行道，有效提升了道路通行能力。至于近年来在城市更新中面貌一新，那是新闻了。

20世纪50年代，在党的“双百”方针指引下，文化艺术工作一片欣欣向荣。

革命战争年代，坚持在南通城近、远郊的兴仁、四安、石港、英雄、刘桥、平潮，以及金沙、骑岸等地浴血奋战的革命前辈中，有许多同志植根于这片土地，对具有浓郁地方特色、充满醇厚乡土气息、农村群众喜闻乐见的地方戏曲——童子戏情有独钟。由刘光、沙衡等老同志倡议，经过时任市委宣传部部长曹从坡、市人民委员会文教科长徐冬昌、季茂之等同志的努力，1957年成立了一个市级水平的南通市业余童子戏剧团。

经过一年的摸索和运转，在业余戏剧团的基础上，由政府发文于1958年10月正式组建了南通市童子戏实验剧团，1960年5月更名为“南通市实验通剧团”。市文教科剧团配备了得力干部和管理人员，季敏生、贾佩峰、黄炳文、张清华、朱锦泉、万灿远、周锦堂等一批老同志曾先后在剧团工作过。在他们的带领之下，剧团的各项工作、演出业务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，使南通的童子戏演艺事业走上了一个新的阶段。

剧团几乎集结了童子戏唱、念、做等表演艺术上极有造诣和个人特色、扮相和嗓音都深受观众青睐的一批童子戏艺人。他们中有王金生、陈映田（陈泉）、李金玉、李步高、陈瑞生、陈桂林和陆桂英等人。

童子戏艺术中最主要、即最能吸引观众、打动观众，能让观众如痴如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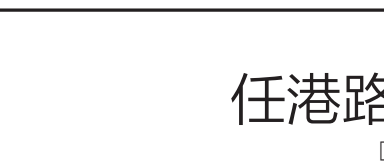
忘掉一切的，是童子的唱功和嗓音。可以说，当时南通近、远郊的观众喜欢听童子戏的那股劲儿，毫不低于“宁舍一顿饭，不舍二人转”的东北老乡。

剧团长王金生唱的童子调高亢豪放、潇洒飘逸，听了以后让人痛快淋漓、浑身舒畅。演员陈映田则各种曲式曲体的童子唱腔信手拈来，演唱雍容华丽、珠圆玉润、棱角有致。李金玉对南路、东路童子曲牌运用自如，唱的童子调委婉、缠绵、甘美、深邃，像涓细溪流沁人心脾。其他的童子艺人也都是行家手里，各有妙招。剧团就是一个童子戏人才荟萃之地，他们都可称观众心目中的明星。

剧团借住市文化馆大成殿后中院及洋宫桥旁的两层小楼，日常练功、排练以及市区小型演出都在文化馆的小剧场里进行。几年下来，剧团除了演绎童子戏中素有观众口碑的一批古装传统戏剧目（如《李兆庭》《秦香莲》《珍珠塔》等）外，也挖掘和抢救了一批濒临失传的老童子戏剧目，如《陈英卖水》《王清明合同记》《秦雪梅吊孝》等。与此同时，还创作和排练了一批反映新社会、新生活、新思想的现代剧目，如《抢伞》《丰收之后》《水稻大王》等。演出使用的服装、道具、灯光、布景等也是设法不断创新，老观众们反馈过来说有耳目一新的感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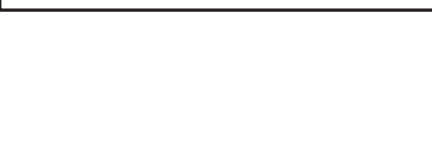
剧团还逐步吸收了一批新型的文艺青年，又从市歌舞话剧团、越剧团、南通县文工团选调人员，充实队伍。

1959年12月的江苏省地方戏曲观摩汇报会上，童子戏首次走出南通，



任港路，位于南通城西南隅，因邻近的任港河及长江边的任港码头而得名。任港路东起孩儿巷南路、西至长江中路，全长2.7公里。任港路始建于民国初年，已有百余年历史，曾是城区通往任港码头的唯一交通道路，时仅通行人力车。1946年改建成碎石路面。1966年任港路改名为“大庆路”（1971年任港河上新建的双曲拱结构大桥也命名为“大庆桥”），1981年恢复原名任港路。

1960年，新建南通港客运码头，新



任港路，位于南通城西南隅，因邻近的任港河及长江边的任港码头而得名。任港路东起孩儿巷南路、西至长江中路，全长2.7公里。任港路始建于民国初年，已有百余年历史，曾是城区通往任港码头的唯一交通道路，时仅通行人力车。1946年改建成碎石路面。1966年任港路改名为“大庆路”（1971年任港河上新建的双曲拱结构大桥也命名为“大庆桥”），1981年恢复原名任港路。

1960年，新建南通港客运码头，新

遥想启东国文专修学校

□田耀东

这本《崇明外沙私立启东国文专修科艺林第一集》的原主人杨宴鸿的外公是前清秀才，年轻时曾追随黄兴共建“苏州垦业学院”，科举废止后，和同样是秀才的兄弟在海门汤家镇合办私塾。中国近代作家、学者卞之琳就住在隔壁，小时在陈氏私塾启蒙，“明月装饰了你的窗，你装饰了别人的梦”——后续的故事就从故乡的窗口走遍万水千山。



1918年，时属崇明外沙的一所学校出版了《崇明外沙私立启东国文专修科艺林第一集》，此书在几年前被南通大学徐乃为教授发现并校注，经政协启东市委员会编辑，于2020年12月再次出版（见上图）。书中记述了启东设校前曾出现过的一所私立大专学校——启东国文专修学校，并收录了学校学生、老师的文章和诗歌103篇。

民国初年，启东还未设县，其南部称崇明外沙。1928年设县时，当时的启东仅限于这一地区。1949年后，启东的疆域才包括了南部、中部和北部。圩角镇（现属启东汇龙镇）的位置就在当年的崇

明外沙。启东国文专修学校的校长倪华清、庶务张贤是圩角镇人，校董施滋培是新港镇人，校董祝应乾是久隆镇人。这些心系教育改革的崇明外沙人聚集在一起办学，圩角镇交通发达、商贸繁荣，把学校设在这里，当在情理之中。

学生倪诗酒在命题作文《上巳旅行记》中写道：“早餐既毕，排队出校……北走长堤，约五六里，至永昌高等小学。停二时，复西循河折北，至三丫支镇，北行蜿蜒直赴尚平两等女学……午留膳。膳毕，入内参观，越时复南行，经久隆镇，过农业校……又西至大生分厂……遂与同学周行而出。时则夕照满林，斜阳一角，新月一钩，横挂天末，玉弯眉态，依依恋人……”从文中记述的步行的路途和时间，也可确定学校的校址。

学校配备了优秀的老师，监学兼教授文学林的谢鸣谦、教授经学说文的李辰都是前清举人。学校还聘请了名医王祖绳为校医。王祖绳，字子贤，海复镇人。1925年孙中山病重，王子贤与校长倪华清、教授国文诗词地理的主任邱啸天、圩角镇学生薛昌等一同前往北京市东城区地安门东大街23号铁狮子胡同顾维钧住宅，王子贤为孙中山诊脉，时孙中山肝癌已至晚期，王子贤开了中药，减轻了他的病痛，延缓了生存期，得到孙中山的赞扬和肯定。

艺林第一集在启东设县十年前就出

版了，但版权页却用了启东称谓，因为校长倪华清与校董施滋培、祝应乾，正是当年最早提出设县主张并为之奔走呼号的主要人士。

施滋培早在宣统二年（1910）就上书张謇，提出外沙分治设县的主张。祝应乾则联合外沙十乡乡董在1911年上书江苏都督程德全“恩准分立一县”。

施滋培在陈病尧编辑的《启东设治汇牍序》中说，设县之资助者，“始以施子少岩、祝子筠青（应乾）为最，继以倪子耕渔（华清）为最”。

《请愿分县记略》中说：“民国四年……倪耕渔划舟招住，请常往伊家，专办分县。”可见倪华清动用了自己的亲戚关系，并把家作为请愿分县的办事场所。施滋培民国二年致张謇函中说：“培在宣二年（1910）主划崇邑大江以北，通海东部合成一县……取名启东，经省会议决。”在《启东设治汇牍序》中又说：“培所定启东县名，至今春（1928）而显。”

倪华清、施滋培、祝应乾在1918年所以率先把作为县名的“启东”二字嵌入书名，正是为分治设县而呐喊。

三位为设县奔走的领袖人物还把自己的主张贯彻到教育中去，平时学生的作业就有分治设县。

学生倪诗酒在《送施宗道（滋培）先生赴金陵请愿分治序》的命题作文中写道：“外沙新涨之地有三千方里，土著之

民已三十万；实业农桑，无日不进，殆天将有意启我外沙欤。则安可以隔江跨治，而附属之耶？于是，外沙十乡父老昆弟，公举施公任分治之事。曰：我外沙非分治，莫能救斯民……”

学生薛昌昌在命题作文中写道：“吾外沙土地广大，人口庶繁，物产丰富，贸易茂盛……地方之发达，可谓盛矣……而远隶崇明，隔江跨治，政令难周。富者损财谋生，贫者苦痛尤加。此施宗道先生发起外沙分治之说所由来焉。”

学生倪诗酒在《赠施宗道先生》的七律中写道：“浩歌长啸气如虹，为国为民五载中。策论纵横惊海内，风尘奔走尽江东。”

从这些诗文可以看出启东国文专修学校注意让学生关注政治、关注民生，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，实在难能可贵。

学校设教职员工9人，学生39人，海复的学生13人。学生的通信联络通过各镇的商家进行，如倪诗酒通过东兴镇协和泰、王亮寅通过海复镇沈长泰、王伯原通过海复镇瑞和堂。

文章诗词佳佳的学生倪诗酒后来成为医术高超的中医，因受江允昇的感召，于192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，在后来的夺枪斗争中，因叛徒告密，1930年8月与江允昇一起英勇就义。

徐乃为教授发现并校注的这册孤本，向后人揭开了这段尘封的过往，让人不禁遥想那些早已远去的鲜活身影。



清廉武官高山公

□海华

1921年秋，清末翰林沙元炳为同乡如皋《高氏宗谱》作序，言及：“南乡高氏，县之巨族也。其闻人名达于方志者六。”所谓巨族，必是名人辈出。沙公序中就有例证：“当清康熙时，高氏山公、涟漪两先生，父子继业，并缘武勋，成吏绩，著声蓟、豫、闽、湘间。”

“高氏山公”就是高严，字山公，生于1661年，任户部江西清吏司正郎、永安县知县、河南孟津县知县、工部都水司主事等职。《高氏宗谱》中录有他的两篇传记。一篇是清代同乡进士姜任修撰文的《户部公传并赞》，另一篇是《户部公邑乘原传》（即录在《如皋县志》），恰巧佐证了沙元炳序言中“闻人名达于方志”的说法。

兹将两篇传记及其他史料，将高山公的履历与事迹整理出来，以示这位清吏武官的高贵品质。高山公从小就是一位孝子。他小时有德有才，性格醇厚。母亲朱太夫人，身患重病，服药无用。高山公小小年纪，发愿以身代替。他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：一位仙人给朱太夫人送来一颗金丹。随后，朱太夫人竟然痊愈。这段佳话录入了《维扬华王庙堂碑》。

高山公少年入伍，非常人可比。《户部公像赞》首句便是“十三从军，功成名立”。13岁时，他已随军生活。15岁时，他已被姚启圣招至麾下。高山公精通奇门遁甲，又善于击剑，能于百步之外杀死敌人。时年为康熙乙卯年（1675），耿精忠已起兵造反。姚启圣被提拔为浙江温处道金事，参与平定宣平等地叛军。一日，高山公报告姚启圣说，今夜必有贼人来袭，自己可立功。姚启圣觉得他年纪尚小，未引起警惕。原来，一个都司有罪在身，于是通贼，准备当晚潜逃。待到入夜，两个贼人潜入军寨，带着都司逃亡。姚启圣完全不知。高山公早有预料，一路追击，屡出飞剑，在军寨十里外，斩杀都司与两个贼人。他又计上心来，携带王文、张忠两个仆人，冒充都司，贼人前往敌寨。大雾弥漫，敌人酣睡，站岗人竟然没有辨认出他们的身份。三人趁着天黑，杀入敌寨。贼人如同惊弓之鸟，不明高山公等只有三人，混乱中竟互相残杀。姚启圣又带兵赶到，内外夹击，待到天明，一举捣毁15个山寨。姚启圣上奏朝廷，为高山公请功。年仅15岁的高山公，功加十九等，获赠正一品服。王文、张忠，都成为都司。

姚军攻克永安县，任命高山公为知县。时经兵燹，百废待兴，百姓待救。高山公清廉勤政，出资救人，将死人一一下葬，将病人一一治愈，将食物、衣物送给穷人，还鼓励年轻人结婚。在他的治理下，永安县百姓获得很高的幸福度，传文赞曰：“民有生成之乐。”日后，高山公回如皋丁忧结束，再任河南孟津知县。他重清廉，施仁政，惠泽一方，百姓为他建造生祠，传为一时佳话。抚军阎公上奏朝廷恳求提拔高山公。康熙甲戌年（1694），高山公调任工部虞衡司任职。由于平日清廉，他的盘缠有限。从河南走水路进北京，船行至河中，艄公发难，向高山公索要五十金，他囊中不富，面露难色，只好责备艄公要得太多。艄公直言不能再少，否则免谈。他边说边要掀翻船只。高山公无奈之下，只能答应付钱。事后，大概艄公猜想京官怎会小气如此，笑他不可能管理虞衡司的官员。两年内，他又转任户部江西清吏司正郎，管理南新仓事。他未雨绸缪，平日存粮，待到灾年，大量百姓得以存活。

这位长期在外的清吏武官高山公，很是思念家人，常有家书诗作往还。家谱中留下他的一首《答兄》，道出其生平功绩及报国动机：忆自束发始，严亲授句读。勉我作良臣，期我以名宿。乙卯耿举动，行间蒙甲冑。相从西域征，戮力殄渠寇……一身许报国，自分效奔走。国恩不敢忘，亲心不敢负。

下图：高山公画像与《高氏宗谱·高氏家集·高严》书影。



紫薇书院与紫琅书院

□王士明

通州最古老的书院在通城寺街街区的北部，名紫薇书院。关于紫薇书院的记载，最早见于明万历《通州志》卷五《杂志·古迹》“紫薇书院在州西北光孝塔右，今遗址尚存”。另收入该志的淮南节制参议王应凤撰写的《通州贡院之记》中提及南宋嘉定年间（1208—1224），知州乔行简移通州贡院于紫薇旧宅，“是邦病湫隘，遂迁于州治西溪紫薇旧宅”，其址有“光孝塔屹立于东南”。由此可知，紫薇书院建于南宋，始办时间不明。书院位于天宁寺西北，相传后来的胡状元府即其址，经实地考察，大体相符。虽然关于紫薇书院的文字记载仅此寥寥，但作为通州第一所书院，紫薇书院永载史册。

寺街还建有通州历史上办学时间最长、规模最大的书院——紫琅书院。通州曾先后建有书院11所，大部分存时匆匆，施教平平，仅存其名而已。唯有始建于清乾隆十二年（1747）的紫琅书院得社会之青睐，招来大批学子。

紫琅书院的创办者为通州知州董权文。乾隆十年（1745），董权文选择了通州城西北部的天真堂为院址，兴工建坊额堂舍，初具规模，定其名。因后继经费不济，书院一度停办。

嘉庆同治年间，书院又经多次维修，教学活动得以正常进行。

翰林侍读张诤担任院长期间，生童“登贤书入祠林者前后二十余人”。紫琅书院为文人名流荟萃之处；乾隆《直隶通州志》、光绪《通州直隶州志》皆出自紫琅书院。紫琅书院历经百余年，院舍几度修复，课程数番更定，至清末科举制度废除方止。

光绪二十八年（1902），通州张謇、张謇及范当世等人倡议设立通州高等小学，在紫琅书院等处兴建校舍。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）春学校开学，紫琅书院在此前已停办。

紫琅书院留给后人的资产有民田401.7亩，每年田租收入有778元；沙田及沙粮田10000余亩，每年田租收入3081.7元。这笔资产为新兴教育的发展作出了贡献。

征 稿

“城市记忆”设有江海廉韵、传家宝、老照片、史海回眸、地名掌故等栏目，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。来稿图文结合为佳。投稿邮箱：csjy1000@163.com。